

《漢書》研究文獻輯刊

吳平 曹剛華 李珊珊◎輯

《漢書》研究文獻輯刊

一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漢書》研究文獻輯刊/吳平,曹剛華,查珊珊輯. —北京: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2008.8
ISBN 978 - 7 - 5013 - 3598 - 5

I. 漢… II. ①吳…②曹…③查… III. ①中國—古代史—西漢時代—紀傳體
②漢書—研究—參考資料 IV. K234.104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201861 號

書名 《漢書》研究文獻輯刊(全十冊)

著者 吳平 曹剛華 查珊珊 輯

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(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7號)

發行 010 -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

66174391(傳真) 66126156(門市部)

E-mail cbs@nlc.gov.cn(投稿) btsfxb@nlc.gov.cn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

開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16

印張 369

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 - 7 - 5013 - 3598 - 5 / K · 1603

定價 6700.00 圓

《漢書》學簡論（代前言）

曹剛華

何謂《漢書》學？簡單地說，是對《漢書》及其相關衍生物研究的再研究。意即它是一種以《漢書》為中心，兼及相關多種史體、著作群的學術體系。主要包括班固及《漢書》的研究，《漢書》的價值及其對後世文獻編纂的影響，後世對《漢書》的注釋、校勘、改編、刊刻、補訂，《漢書》學術史研究四個方面內容。而《漢書》學之所以能够成立，主要是因為：

首先，《漢書》本身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，無不以《漢書》作為重要依據，這也是其能够成為專學的首要條件。具體來說，它的價值又體現在以下幾方面：在文獻編撰學方面，班固在繼承了《史記》編撰體例的基礎上，又有所創新。他首次將斷代意識與紀傳體相結合，設置了十二紀、八表、十志、七十列傳，用以記述西漢一代史事，從而創建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書。他在編撰體例上繼承了《史記》，但並不保守，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有所調整，以使編撰形式與內容相統一。如改『本紀』為『紀』、改『書』為『志』，增設東方朔、張騫、《古今人表》、《百官公卿表》等人物專傳和表。還增設了《刑法》、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、《藝文》四志。這些新的創舉都對後世正史的編撰體例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在史學研究方面，《漢書》是研究西漢歷史重要的資料寶庫。班固非常重視運用原始資料，除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《史記》外，武帝以後部分則大量採用了詔令、奏議、詩賦、天文曆法書等第一手史料，如《治安策》、《舉賢良對策》、《教太子疏》等等。另外，像《漢書》的『紀』記錄了西漢歷代帝王的歷史，上至軍國大事，下至民間吉慶災荒，無不一一記明年月。『傳』則記載了西漢各類人物的生平故實

及少數民族、西域各國的風土人情。『表』既有敘述秦漢官制演變、記錄漢代官制的《百官公卿表》，也有記載遠古至楚漢之際人物的《古今人表》。而律曆、禮樂、刑法、食貨、郊祀、天文、五行、地理、溝洫、藝文這十志則從專志的角度涵蓋了西漢所有典章制度、天文地理和各種人口風俗、工農業發展等諸多社會真象。這些記載均為我們研究西漢歷史，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資料。在文學研究方面，《漢書》是一部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傑出作品。它結構嚴謹，煉詞簡潔，出現了《東方朔傳》、《朱買臣傳》、《霍光傳》、《王莽傳》、《外戚傳》等經典名篇。在行文風格上，由於受到兩漢散文盛行的影響，行文傾向排偶，多用古字，重詞藻，尚典雅，對後世傳記的撰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兩漢傳記文學的重要資料。

其次，正是由於《漢書》具有重要的學術影響，歷代學者在對《漢書》體例、史料、文學風格等多所模仿和運用的同時，也很重視對《漢書》本身的注釋、校勘、改編、刊刻、續作，這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，為《漢書》學的形成奠定了豐厚的學術積累，同時也為《漢書》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學術空間和前景。

當然，作為一種專門之學，《漢書》學亦會隨着各時代社會環境、學術環境的不同，而發展、變化，從而形成了各具時代特色的《漢書》學。

一

共行鑽仰，是唐代學者司馬貞對《漢書》在漢唐之際盛行現象的一種總結。可以說，《漢書》在當世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，『當世甚重其書，學者莫不諷誦焉』。（《後漢書·班固傳》）相關研究之作隨即產生，如許慎的《漢書許義》、應劭的《漢書集解》、服虔的《漢書音訓》等等。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是《漢書》學發展的黃金階段。一方面續寫、仿倣《漢書》的著作不斷涌現，出現了司馬彪《續漢書》、范曄《後漢書》、劉義慶《後漢書》等大批優秀的史學

作品，從體裁上影響了較長時段的史學撰述，正如《隋書·經籍志》所言：「自是世有著述，皆擬班、馬，以爲正史，作者尤廣。」《續漢書》，西晉司馬彪撰，他認爲漢代「時無良史，記述煩雜，……安順以下，亡闕者多」，以至忠臣義士之事無以昭顯，故而「討論衆書，綴其所聞，起於世祖，終於孝獻」，仿倣《漢書》體例，「通綜上下，旁貫庶事，爲紀、志、傳，凡八十篇」。（《晉書·司馬彪傳》）《後漢書》更是繼承、完善《漢書》體例之大成者。撰者范曄，南朝宋人，經常以班固《漢書》爲自己撰述的目標，「嘗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」。在充分借鑒《漢書》體例，參考十餘種當時漢晉史家後漢史書的基礎上，最終撰成《後漢書》。（《宋書·范曄傳》）

另一方面，注解、講授《漢書》的學者也越來越多，所謂「師法相傳，並有解釋」，《漢書》學遂成爲當時一門顯學。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，當時《漢書》研究可以分爲四大類，一是集解式，即彙集衆家之言注解《漢書》者，如晉灼《漢書集注》、陸澄《漢書注》等。二是對《漢書》的訓詁、音義研究，如韋昭《漢書音義》、劉顯《漢書音》、姚察《漢書訓纂》等。三是質疑《漢書》者，如劉寶《漢書駁議》、姚察《定漢書疑》等。四是節選《漢書》者，如葛洪《漢書鈔》等。故唐代史家劉知幾在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篇中說：「始自漢末，迄乎陳世，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，至於專門受業，遂與《五經》相亞。」充分總結了漢唐之間研究《漢書》者百家紛爭、共行鑽仰的歷史局面。

二

隋朝的《漢書》學則出現了迅猛發展的勢頭。其時天下學者多尊崇《漢書》，《漢書》學遂走向高潮，成爲當時的『國學』。（《隋書·劉臻傳》）學習、注釋《漢書》成爲大多士人必修的功課。如隋人李密，「調贍親故，養客禮賢，無所愛吝，……下帷耽學，尤好兵書，誦皆在口。師事國子助教包愷，受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勵精忘倦」。（《隋書·李密傳》）隋末人趙弘智，自小「事父以孝聞，學通《三禮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」。（《舊唐書·孝友傳》）其時蕭該、包愷則並稱爲《漢書》大師，他們關於《漢書》的學說則成爲當時學者之所尚，「天下學者以蕭、包二人爲宗匠，聚

徒教授，著錄者數千人」。（《隋書·包愷傳》）

應該說，隋朝《漢書》學雖然繁盛，但它並沒有解決南北《漢書》百家之爭的局面，天下學人或以蕭該、包愷為準，或以韋昭、姚察、葛洪爲是，各抒己見。唐高祖李淵登基後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，唐初的《漢書》學也是百家紛紜，各宗其是。有影響者如李善、秦景通、顏遊秦等，或時人皆「宗師之」，或其說爲後世所尚。

而唐顏師古注的出現則改變了這種局面。他少有文才，「貞觀七年，拜秘書少監，專典刊正，所有奇書難字，衆所共惑者，隨疑剖析，曲盡其源。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」。作爲著名的《漢書》學者，其「注班固《漢書》，解釋詳明，深爲學者所重」。（《舊唐書·顏師古傳》）與以往《漢書》研究不同的是，他在應劭、服虔、晉灼、臣瓚、蔡謨等五種注本外，更增加了荀悅《漢紀》、崔浩《漢紀音義》、郭璞注等二十三家的精華，堅持「凡舊注是者，則無間然，具而存之，以示不隱」，「其有指趣略舉，結約未伸，衍而通之，使皆備悉」，「至於詭文僻見，越理亂真，匡而矯之，以祛惑蔽」，「若泛說非常，蕪詞競逐，苟出異端，徒爲煩冗，只穢篇籍，蓋無取焉」的原則，融合、發展了南北《漢書》各家之說，卓然而成一家，成爲後代研究《漢書》的經典作品。

此後，敬播、劉伯莊、顧胤等人對《漢書》音義等的相關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。敬播頗受房玄齡的器重，「以顏師古所注《漢書》，文繁難省，令播撮其機要，撰成四十卷，傳於代」。（《舊唐書·敬播傳》）劉伯莊，徐州彭城人，「撰《漢書龍朔中，兼授崇賢館學士」，「撰《漢書音義》二十卷，行於代」。（《舊唐書·劉伯莊傳》）顧胤，蘇州吳人，「撰《漢書古今集》二十卷，行於代」。（《舊唐書·顧胤傳》）

劉知幾《史通》則從理論的角度，對《漢書》進行了總結。他認爲《漢書》「辭惟溫雅，理多愜當，其尤美者，有典誥之風，翩翩奕奕」。（《史通·論讀》）「言皆精煉，事甚該密」，爲後代史書做出了榜樣，「自爾迄今，無改斯道」，充分肯定了《漢書》的價值，對其讚賞有加。但在肯定的同時，他也提出了《漢書》的不足。如他對班固在神學迷信思想影響下創立的《五行志》進行了嚴厲批判。他認爲漢代大事變化是有發展規律的，這種將神學色彩賦

予史學撰述的做法毫無價值可言。在史書撰述體例上，劉知幾也有不同意見。如他認為《古今人表》、《天文志》、《藝文志》在體例設置上就有很多問題，提出了『前書不應有《古今人表》』（《史通·自叙》），『《天文》之於《漢史》，實附贅之尤甚者』的批評。（《史通·覈才》）可以說，劉知幾的《史通》是繼顏師古後的又一重要著作，二者不同之處在於，顏師古的研究更多的是在注釋、訓詁、音韻上對前代《漢書》學予以大總結，劉知幾則是首次站在史學批評的角度，從理論高度上品評《漢書》的優劣，及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，為後世史學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
三

相比共行鑽仰、百家紛爭的南北朝、集大成者的隋唐，宋代《漢書》學則進入了一個社會化、校勘化、刊刻化的時代。

在官方看來，《漢書》是天下學人必修的文史之一，『頒行』方能流行天下。（《金史·徒單鑑傳》）因此教授學生、士人中舉等選用《漢書》時，都以顏師古的《漢書注》為標準，所用版本『皆自國子監印之，授諸學校』（《金史·選舉志》）可見官方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管理之嚴格。

在上層士大夫看來，《漢書》是引經據典、陶冶性情的常用書籍。韓琦就以《漢書》中的典故勸鑒帝王。（《宋史·韓琦傳》）安德裕也『博貫文史，精於《禮》、《傳》，嗜《西漢書》』（《宋史·文苑傳二》）隱士蘇雲卿則借《漢書》來陶冶性情。（《宋史·隱逸傳下》）等等。

《漢書》也是學術研究的必備之書。在研究方面，宋代學者更多的是對《漢書》進行校訂、勘誤與評論。《漢書》傳至宋代，已近千年，其間百家紛爭，注釋繁多。因此在《漢書》由卷子本轉向木刻本時，曾由『三劉』進行校勘訂誤，『三劉』即北宋劉敞兄弟及其子劉奉世。宋祁亦對《漢書》寫有校語，今殿本尚存『三劉』勘誤及宋祁校

語。此外，吳仁傑也撰有《兩漢刊誤補遺》，「書中乃兼補正劉敞、劉奉世之說」，「每卷多者不過十四頁，少者僅十二頁，勢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。而十卷之中補前漢者八卷，補後漢者僅二卷，多寡亦太相懸。殆修《宋史》時已佚其七卷，以不完之本著錄歟。劉氏之書，於舊文多所改正，而隨筆標記，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。仁傑是書，獨引據賅洽，考證詳晰，元元本本，務使明白無疑而後已，其淹通實勝於原書。雖中間以「麟止」爲「麟趾」之類，間有一二之附會。要其大致，固瑕一而瑜百者也。曾絳《序》述周必大之言，以博物洽聞稱之，固不虛矣」。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史部《正史》）

關注《漢書》的史事、評論及其在考據學、目錄學上的作用也是宋代學者研究《漢書》的一大特點。他們或討論《漢書》的內容真僞佚存，或闡明流派，商榷分類得失，將《漢書》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領域。楊侃對《漢書》頗有研究，「景德中，侃讀兩《漢書》，取其中名數前儒解釋爲此書，以資涉獵者」，編撰成《兩漢博聞》一書。（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五）南宋晁公武不僅品評《漢書》成書的環境、體例、著者，還對范曄、劉知幾等對《漢書》的指責提出了看法，他認爲這些「非固之罪也」，「受金鬻筆，固雖諂附匪人，亦何至是歟？然識者或以固書皆因司馬遷、王商、揚雄、劉歆、向舊文潤色之，故其文章首尾皆善，而中間頗冗瑣，良田商之才視數子微劣耳。固之自序稱述者，亦謂有所本歟？」爲《漢書》辯解。（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五）倪思撰述《班馬異同評》三十五卷，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兩部史學名著進行了比較研究，後人稱讚其「評泊批點，臻極精妙」。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史部《正史》）

宋人王應麟可以說是研究《漢書》的佼佼者。王應麟，字伯厚，號深寧居士，南宋著名學者，先世河南開封，後遷居浙江鄞縣。他自幼聰明好學，發憤讀書，九歲時通曉《六經》，宋理宗淳祐元年中進士，以博學多才名振朝野。他的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是最早研究「漢志」的專著。王應麟因「漢志」雖有顏師古注，但頗簡略，名字、籍貫、名物、音義以外涉及者寥寥，所以他廣搜群籍，加以注考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彌補了前人之不足，始開後世研究《漢書》「專志」之新途徑，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。（參見馮三元《歷代〈漢書·藝文志〉研究綜述》，《圖書館》，2000

年第2期)

不僅上層達官貴人研讀《漢書》，下層百姓、僧道也讀《漢書》，如宋代許多高僧精通儒家文史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也是僧人需要學習的內容之一。僧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就引用了大量《漢書》中的資料。僧契嵩在融通儒家之道、道家之道、佛家之道時，也引用「老氏流者蓋出史官」、「合於堯之克讓，易之謙謙，此之謂也」等《漢書》中的史料，來證明自己的觀點。這些都表明《漢書》在宋代社會流傳之廣泛。（《鐔津文集》卷十四《非韓子》篇）

由於雕版印刷術和造紙術日趨發達，為《漢書》的刊刻提供了良好條件，宋代官私刻本精良可名者甚多。如官刻淳化本始於北宋淳化五年，「詔選官分校《史記》、前、後《漢書》，校畢，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」。轉引自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卷二十二，後有宋祁參用諸本校《漢書》，其中即有淳化本，版刻式樣與宋浙本略同。清人杭世駿《欣托齋藏書記》總結其特點說：「宋刻兩《漢書》，板縮而行密，字畫活脫，注有遺落。」（轉引自《書林清話》卷二）

現存最早的官刻本是北宋仁宗年間的景祐本。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記載了此本刊刻的經過：「景祐元年，秘書丞余靖上言：「國子監所印兩《漢書》，文字舛訛，恐誤後學，臣參括衆本，旁據他書，列而辯之，望行刊正。」詔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，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，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。二年九月校書畢，凡增七百四十一字，損二百一十二字，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。」（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卷二十二）此外，宋代官刻本還有景德本、熙寧本、紹興本、淳熙二年湖北茶鹽司本等等。

宋代私家刊刻《漢書》著名者有黃善夫、蔡琪、王叔邊等人。黃善夫，福建福安人，以刻書聞名，所刻書有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》、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等，並與劉元起一起合刻兩《漢書》流行於世。此外，建安蔡琪也以刻印《漢書》聞名於世，錢塘王叔邊也刊有《前漢書》一百二十卷，如此等等，均表明宋代《漢書》學進入了刊刻時代。

元代《漢書》學繼承了宋代一些特點，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多有刊刻、校勘、注釋《漢書》的活動。如大德九年，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『從太平學官之請，遍牒九路，令本路以《西漢書》率先』，（元大德九年刻本《漢書》孔文聲跋）校勘、刊刻十九史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也對《漢書》的流傳、撰述等問題有所考證。但元代《漢書》學的發展也有自己的變化，即元代是個民間講史的繁盛時期，類似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優秀史學作品通過大眾演繹而更加流行於民間，形成了講史平話。現存的《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》即是其中傑出的一部，該書作者姓名已佚，一般認為是元代講史藝人講說之底本，未見歷代藏書家著錄。可以說，講史平話的出現使得《漢書》在元代更加民間化。

明代則是《漢書》收藏、刊刻、校勘與研究並重的時代。就收藏而言，上至王公貴族，下至民間百姓多有收藏《漢書》者。如明代官方書目《文淵閣書目》即著錄有《前漢書》、劉敞《漢書標注》、王益之《西漢年論》、《前漢贅論》等。私家收藏書目如徐氏《紅雨樓書目》也著錄有《漢書》、《前漢紀》等等。就刊刻而言，明代《漢書》的刊本可謂多種多樣，遍佈全國各地。官刻的有南京國子監嘉靖九年刊本《前漢書》、嘉靖二十八年福建按察司刊本《漢書》顏師古注本。藩刻的有德藩最樂軒刻本《前漢書》。家刻的有崇禎十五年毛氏汲古閣刻本《前漢書》、萬曆九年凌稚隆自刻本《漢書評林》、萬曆浙江錢塘縣林鍾人傑刊本《前漢書》、萬曆歙縣書林吳勉學刊本《漢書》、嘉靖泰安徽和縣歐陽鐸刊本《漢書》、崇禎十二年葛鼎刻本《漢書》等。坊刻的有崇禎江蘇金陵書林唐際雲積秀堂刊刻的《漢書評林》、余彰德的書林刻本《漢書評林》等。

在校勘與研究方面，凌稚隆的《漢書評林》、孫鉉的品評、陳仁錫的品評、鍾伯敬的評論、葛錫璠的彙評等都可視為明代《漢書》研究的代表作，其中又以凌稚隆、孫鉉為優。凌稚隆字以棟，烏程人，以注釋、刊刻《史記》、《漢

書聞名於世。凌稚隆的《漢書評林》爲明代《漢書》研究的集大成者。其特點有三：第一，在版本選擇上，他認爲『《漢書》自宋本以來世所梓多譌舛，不足據』。因此《漢書評林》在版本上『一準宋本，而以監本參訂之，反覆雠校，點畫不謬，庶幾與宋本相編云』。第二，在注釋上，他彙集歷代名家品評《漢書》之精華，『顏氏輯數十家之注而定其是非，故世稱顏氏爲班史忠臣，而《漢書》注遂定於顏氏，嗣後如三劉刊誤，朱子文辨正等書別有考據』，故凌氏將其對《漢書》的注釋也一並收入。第三，除了注釋之外，他也注重前代對《漢書》品評的研究，他認爲『《漢書》原無批評，隆周咨諸名公家藏批評本及東漢以來議論漢史，如《班馬異同》、《黃氏日鈔》之類議論。……至於歷代文集間有品隲《漢書》者，亦爲掇拾其論次並以鏤之上方云』。（凌稚隆《漢書評林》凡例）與凌稚隆《漢書評林》不同，孫鉉對《漢書》的研究主要在於評論。孫鉉，字文融，號月峰，餘姚人。他對《漢書》品評的最大特點，在於『抑書而尊史』，故而時人讚道品評《漢書》者，『當以月峰先生爲定案，善爲評者，不出此也』。（馮元仲《孫月峰評〈漢書〉序》）

五

明清之際，顧炎武、黃宗羲等人認爲學術要關心時務，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，主張從文字、音韻、訓詁之學入手，以求訓詁名物的真義，此主張間接影響了清代學術的『考據化』，亦爲清代《漢書》研究創造了有利條件。由於《漢書》是正宗史學，加上書中古字、古訓、典章制度與考據至爲密切，故清代學者多致力於此書。縱觀清代《漢書》研究，主要特點是在繼承、發揚了漢代訓詁學和宋代校勘學的基礎上，充分運用了清代考據學辨析毫芒，窮極流別的方法，在注釋與考釋、校勘與版本研究、輯佚、表志研究及品評史事等諸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，從而將《漢書》學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。

《漢書》注釋與考釋：清代學者多針對歷代《漢書》流傳中出現的注釋錯誤進行考辨，補正闕失。如錢大昭

《漢書辨疑》、杭世駿《漢書蒙拾》、沈欽韓《漢書疏證》、齊召南《漢書考證》、李慈銘《漢書札記》、朱一新《漢書管見》、王榮商《漢書補注》、何若瑤《漢書注考證》等著作，均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《漢書》注釋研究的新成果。其中又以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最爲著名。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王先謙針對顏師古注『未發明者固多，而句讀僞誤，解釋舛駁之處亦迭見焉』的情況，採用蕭詒、宋祁、顧炎武、齊召南、錢大昕、王念孫等人的研究成果，以汲古閣本爲底本，在注音、句讀、解釋篇目、考證地理、解釋顏注等方面糾正了舊注之誤，是繼顏注後對《漢書》進行的又一次大規模整理。（《漢書補注·序例》）

《漢書》校勘與版本研究：此類著作糾正了歷代傳本及刻本中大量錯誤，大體上恢復了《漢書》的本真。如史學海之《漢書校證》、周壽昌之《漢書注校補》、王念孫之《讀漢書雜誌》等。其中以王念孫在此方面的成就和影響最大。

《漢書》之輯佚：這類成果亦具有重要價值，如臧庸輯隋人蕭詒《漢書音義》，王仁俊輯漢人許慎《漢書許義》及《漢書古注》、《漢書佚文》等等，都爲後人研究《漢書》提供了寶貴資料。

《漢書》志、表的研究：志的研究以《藝文志》、《地理志》成果爲多，影響也較大。《藝文志》研究方面，有姚振宗《漢書藝文志條理》、《漢書藝文志拾補》、王先謙《漢書藝文志補注》、王仁俊《漢書藝文志校補》、孫德謙《漢書藝文志舉例》等。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先秦至漢中葉的古代書目和相關文獻資料，而且諸多考證還解決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源流問題，其價值不可謂不大。關於《地理志》，清人下功夫最大，較著名的有徐松《漢書地理志集釋》、王紹蘭《漢書地理志校補》、陳澧《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》、吳承志《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》、吳調陽《漢書地理志詳釋》、汪士鐸《漢志釋地略》、楊守敬《漢書地理志校補》等。對《漢書》表的研究，翟雲昇《校正古今人表》、汪之昌《漢書人表考證》、萬斯同《漢將相大臣年表》、全祖望《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》等較爲著名。以上種種，可充分說明，清代《漢書》學專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。

《漢書》的品評：清人不僅在注釋、校勘、專志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而且對《漢書》的體例、史料、史學思想等方面也不乏真知灼見，影響較大。其中趙翼、章學誠等堪為代表。如趙翼所撰《廿二史札記》，對《漢書》的史料來源、體例得失、史學思想等均作了較深入的分析。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作為清代文史評論的力作，對《漢書》的史學地位、史書體例等都發表了獨到、精確的見解，為後人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。

六

二十世紀，《漢書》研究由傳統逐漸向近代學術轉型，並走向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的階段，《漢書》學發展取得了新的突破。二十世紀上半葉是《漢書》研究傳統與新方法並重的時期，一方面，清代傳統的治學思想仍然影響着一批《漢書》研究者，他們或對整本《漢書》，或對其中的《藝文志》、《律曆志》、《匈奴傳》等專志、專傳進行補正、考釋、訓詁和品評，所用方法和立意仍沿襲清代治學風格，如吳汝綸《漢書點勘》、王浩《精校前後漢書精華錄》、李景星《漢書評議》、丁謙《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》、周正權《漢書律曆志補注訂誤》、顧實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、張驥《漢書藝文志方技補注》、葉長清《漢書藝文志問答》、許本裕《漢書藝文志箋》等。

吳汝綸，安徽桐城人。清末進士，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起，主講保定蓮池書院，執教多年，弟子甚眾。後赴日本考察學政，歸國還鄉辦桐城學校。他曾師事曾國藩，由訓詁以通文辭，晚年尤著力於解經，他點勘、注釋古籍多種，務在暢通大義，頗便於初學。《漢書點勘》是其研究《漢書》的代表性著作，作者在顏師古、齊召南等前人的注本上，再次進行訓詁、補正、校勘，並不時穿插自己的品評，頗有清人治學之風。

周正權，清末民初人，字鐵山，湘陰人，晚年講堂湘垣，著有《楚風樓稿》。《漢書律曆志補注訂誤》是其研究《漢書》專志的一部力作，全書以考訂、補注前人《漢書律曆志》研究的謬誤、疏漏為主，特點在於運用古代易學與《律曆志》互證。

顧實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則為當時研究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代表作。顧實，江蘇武進人，古文字學家。早年攻習法科，曾在東南大學執教。後在無錫國專任教，教授中古文學。通多國語言，喜研先秦史籍，著述兼涉史、子、集三部，如《穆天子傳西征講疏》、《論語講疏》、《楊朱哲學》、《說文解字部首講疏》、《六書解詁及其釋例》等，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則是其研究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力作。全書在顏師古、鄭樵、章學誠、孫德謙、王先謙等前人基礎上，將字詞考釋與義理名目相結合，注重作者生平、書籍性質的考辨，既補前人之不足，又有自己的闡釋。『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《漢藝文志》者，猶未盡也。余復為此疏，乃當前人搜羅剔刮，既精既詳之餘，而復有所搜羅剔刮』，方撰述此書。（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序）總的看來，顧實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在方法上沿襲清人治學之路，音訓考證還是其主要手段。在立意上，作者的撰述立場仍然陷在清人今古文之爭中，以講疏《漢書·藝文志》作為其贊成清代古文經學的觀點，仍落入清人治學的俗套。

另一方面，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遷的時代，社會的動盪，救亡圖強意識、改良主義思想、歷史進化論的出現，再加上西方音韻學、考古學、新史學、圖書館學、新文學等學科思想的傳入，國人或是利用近代新史學、新視野的體例方法注釋、考釋、品評，或是維護傳統學術的尊嚴，利用注釋《漢書》反對西方思想的衝擊，使得《漢書》學發展逐漸向近現代研究轉型。

李澄宇《讀漢書蠡述》是當時傳統史家在西學影響下，借用《漢書》研究對抗西方學說的代表作。全書分為三卷，一百一十二條評論，在修訂前人錯誤的同時，重點闡明西學的淺薄。如他談論《漢書》中人物面有反相時說：『狀有反相，亂年與地亦復預言，而終無以改易去運，此豈西人淺薄科學所能了悟者？』他談論龍時又說：『周易及諸經每言龍，史言龍，更隨代而有，西人則力言無此。然龍實神物變化不可測，必持所謂科學者鑿鑿求之，抑可陋矣。』（《讀漢書蠡述》卷一）

梁啟超、顧頡剛、錢穆等人在考辨疑古、實證求真新思想影響下，對《漢書》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梁啟

超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位學問大家，他繼承中國傳統學術的同時，又提倡新史學，闡明新史觀。他結合傳統與西方之長處，對中國古代文獻進行了系統思考，對古籍研究歸納出了規律性的認識，撰寫了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、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》等。他集前賢古籍研究理論之大成，為近代新時期文獻研究建立了理論規模，他以近代科學演繹、歸納等方法，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眼光構建起了文獻科學的理論體系。實際研究中，梁啟超將這種方法運用在《漢書》研究中，撰述了《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》、《漢書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》等文，運用歸納演繹法，注重學術背景分析方法，加上疑古考辨的精神，對《漢書·藝文志》進行了詳細研究。

顧頡剛也用近代史學體例立意、疑古考辨的觀點，重新審視了《漢書》。他對《漢書》中的古史記載進行了系統的考辨和分析，對《漢書》評價很高，尤其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價值。『這個部分寫得好，記敘我國古時各學術、學科、學派的源流，尤其重要的是記載了西漢宮廷藏書目錄，從這當中知道戰國以後的大量書籍的書名』。

（《中國史學入門》）

洪業是中國運用西方圖書館學檢索方法整理、索引《漢書》的第一人。他字鹿岑，福建侯官人。歷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、系主任、圖書館館長、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主任、研究院歷史學部主任，是近現代傑出的國際史學家、教育家，對於中國現代教育、史學研究、對外學術交流等都有重要的歷史貢獻。引得方法，歐美早已十分發達，上自古代經典，下至近世雜誌，多附有引得以備讀者使用，因此西方國家編制引得的方法頗為成熟。這種方法也被學貫中西的洪業運用在中國古代文獻的研究上，他創建了文獻引得編纂處，對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史記》等大量古籍進行引得編撰，其中也包括《漢書》，其《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》一書，為《漢書》研究的深入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
姚明輝《漢書藝文志注解》是在二十世紀初史學影響下，探討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代表之作。該書是姚明輝在武昌高等師範講授《漢書·藝文志》時的產物，該書收錄《漢書·藝文志》原文原注，標明圖書存佚，考證詳實，是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詳注中最早刊出的專著。全書中，作者始終貫穿了一種思想，即《漢書·藝文志》與中國學術的關係，多次提到『無藝文志，是中國無學術史矣』，『夫爲學首宜明源流本末，言中國文學源流者，藝文志爲最』。

二十世紀上半葉，史學方法改進後研究《漢書》的兩部集大成之作是楊樹達的《漢書窺管》和陳直的《漢書新證》。楊樹達，中國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，字遇夫，湖南省長沙市人。年輕時曾留學日本，習『歐洲語言及諸雜學』。曾先後任教於國立師範大學、清華大學、私立中國大學。他在中國語言文字學、古籍整理研究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楊樹達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開始關注《漢書》研究，先後撰述《讀漢書劄記》、《漢書補注補正》，後在此基礎上擴充，撰成《漢書窺管》一書。作者把傳統的治學功力與新的史學方法結合起來，在前人校勘、考訂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，書中對王念孫、王先謙校勘補注謬誤的訂正最有價值。在方法上，除了繼承傳統訓詁注釋的優點外，作者還較注重古物與文獻的互相印證。

陳直《漢書新證》亦是繼《漢書窺管》之後的又一《漢書》研究的力作。作者在文獻考證的基礎上，大量引用了居延、敦煌木簡及漢代銅器、陶器、封泥、貨幣、石刻等考古資料來考證《漢書》。不但在《漢書》研究方法上有創新意義，而且確實利用原始資料訂正了《漢書》問世以來一些原文的和顏師古等注家訓解上的錯誤。正如作者所言：『我之方法，以本文爲經，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爲緯。使考古爲歷史服務，既非爲考古而考古，亦非單獨停滯於文獻方面。』（陳直《漢書新證》自序）

運用唯物史觀研究《漢書》是二十世紀下半葉《漢書》學發展的主流，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，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，對班固、《漢書》以及歷代《漢書》研究取得的成就，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系統、科學的注釋、考辨、評論與研究，出現了大量的優秀論著。如安作璋《班固與〈漢書〉》（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）、王錦貴《〈漢書〉和〈後漢書〉》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）、陳其泰《漢書歷史地位再評價》（《史學史研究》1988年第1期）、施丁《〈漢書〉新注》（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）、倉修良《〈漢書〉辭典》（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）等。《漢書》研究在